

国别与地区

索马里政治伊斯兰的演进与特点^{*}

李福泉

〔摘要〕 索马里政治伊斯兰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壮大于90年代,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先后以伊斯兰联盟、伊斯兰法庭联盟和青年运动为代表。索马里独特的“国情”,给其政治伊斯兰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使其呈现出多种特点:部族主义的渗透与影响;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交织;普遍的武装化和暴力化;外部的强大影响;强烈的反苏菲倾向。索马里政治伊斯兰扎根于本国的现实,代表着部分索马里人摆脱发展困境的一种努力。

〔关键词〕 政治伊斯兰;伊斯兰联盟;伊斯兰法庭联盟;青年运动

〔中图分类号〕 D5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12)06-0071-76

自1991年年初西亚德·巴雷政权倒台以来,索马里陷入了长期混战,成为所谓的“失败国家”。近年来,伊斯兰激进组织青年圣战者运动(Mujahideen Youth Movement,简称青年运动或青年党)频频发动恐怖袭击,引起外界广泛关注。事实证明,政治伊斯兰^{〔1〕}不仅是影响当前索马里政局变化的关键因素,也是分析和认识索马里危机的重要维度。

索马里政治伊斯兰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壮大于90年代,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先后以伊斯兰联盟(Islamic Union)、伊斯兰法庭联盟(Islamic Courts Union)和青年运动为代表,它们作为前后相继的伊斯兰组织,曾深刻影响索马里国内政治和东非地区形势。本文将以上述三个组织为中心,梳理索马里政治伊斯兰的演进过程,^{〔2〕}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特点。

一、伊斯兰联盟的兴起与解体

索马里是非洲唯一一个人口全部为穆斯林的国家,^{〔3〕}伊斯兰文化在当地根深蒂固,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但就起源而言,索马里现代政治伊斯兰是外部思想输入的结果。二战后,在埃及和沙特等国留学或

打工的索马里人逐步把伊斯兰复兴思想带入本国。20世纪60年代后期,名为伊斯兰协会(Islamic Association)和伊斯兰青年联盟(Unity of Islamic Youth Union)的组织先后诞生,它们都接受赛来非耶思想,并深受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影响。^{〔4〕}1969年,西亚德·巴雷发动政变,建立“科学社会主义”政权,限制伊斯兰教在索马里的影响。许多宗教领导人逃往国外,有些与中东的穆斯林兄弟会建立了联系,其他的则接触到了阿富汗等地流行的圣战思想。1984年,伊斯兰协会和伊斯兰青年联盟秘密合并为全新的组织——伊斯兰联盟,它成为此后十几年索马里最强大的伊斯兰政治力量。

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伊斯兰联盟的主要活动经历了由宣教到军事的转变。20世纪80年中后期,它集中精力进行宣传活动,伊斯兰教与政治无法分离是其秉持的主要思想,在非洲之角建立伊斯兰国家是其目标。它不仅在中学和大学中秘密招募成员,也向军队和政府机构渗透。此外,它还在大城市建立了小商人组成的网络,以此为自身奠定经济基础。

1990年年底,西亚德政权濒临崩溃,6位阿富汗反苏圣战者的回国推动了伊斯兰联盟的激进化。1991年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研究”(10&ZD115)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中东热点问题与联合国研究”(12JJD810009)的阶段性成果。

初,为了保护许多成员所属的达鲁德(Darood)部族,伊斯兰联盟与艾迪德领导的索马里联合大会在南部城市基斯马尤展开激战。虽然这次军事行动以失败而告终,却成为伊斯兰联盟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军阀混战的现实使其领导人意识到,要确保组织的生存和目标的实现,就必须依靠强大的武力。^[5]自此,伊斯兰联盟正式进入了圣战阶段。

在中央政权不复存在的情况下,伊斯兰联盟的势力首先在西北部地区获得空前发展。1991年6月,伊斯兰联盟首次召开大会,对组织进行改组,阿里·瓦尔萨梅(Ali Warsame)为主席,哈桑·达希尔·艾维斯(Hasan Dahir Aweys)为副主席和军事机构负责人。伊斯兰联盟逐步形成了跨越国界的世界性网络,渗透到了索马里难民所在的众多国家。它不仅从控制下的港口博萨索(Boosaaso)获得资金,还得到沙特私人 and 世界穆斯林联盟等组织的捐助。而且,它还利用国内的混乱环境,涉足零售、通讯和小工业等多个经济领域,成为大批索马里贫民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6]1992年6月,伊斯兰联盟宣布在索马里西北部建立伊斯兰政府,却很快被当地的主要力量索马里民主拯救阵线(Somalia Salvation Democratic Front)击败,600多名民兵被杀。遭此打击后,伊斯兰联盟的主力转移到了西南部靠近埃塞俄比亚的盖多州(Gedo),又一次在当地建立了事实上的地方伊斯兰政权。它禁止居民携带武器,重建安全和秩序,劝说众多国际非政府组织和捐助者到盖多州开展活动,但由于严格执行伊斯兰教法,比如强制妇女戴面纱、禁止种烟草等等,它并未受到民众的普遍欢迎。^[7]

伊斯兰联盟在索马里本土发展的同时,其成员也在埃塞俄比亚的欧加登地区(索马里人占据多数)活动。1990年,他们在当地索马里人中组建了分支机构——西索马里伊斯兰联盟,试图“解放”欧加登地区,在整个东非建立由所有索马里人居住的区域构成的大索马里国家。^[8]1991年,它开始在欧加登地区发起游击战,进入1995年,它进而在亚的斯亚贝巴(埃塞俄比亚首都)等城市对市场和宾馆等场所发动恐怖袭击。^[9]为了消除这一威胁,埃塞俄比亚军队在1996年8月和1997年1月先后两次越境进入盖多州,重创伊斯兰联盟总部,伊斯兰主义者四散逃亡,许多成员来到首都摩加迪沙参与创建伊斯兰法庭的活动。至此,作为组织的伊斯兰联盟不复存在,索马里政治伊斯兰第一阶段宣告结束。此后,它的不少成员依然在秘密活动,但重建组织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虽然如此,它的激进思

想对后继索马里伊斯兰组织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成员成为伊斯兰法庭联盟和青年运动的骨干和领导核心。

二、伊斯兰法庭联盟的短暂兴盛

作为伊斯兰联盟之后索马里主流的政治伊斯兰组织,伊斯兰法庭联盟的兴起是饱受战乱之苦的索马里人以法庭形式维护自身安全的产物。法庭通过执行伊斯兰教法和习惯法,既向普通百姓提供必要的安全,也为伊斯兰主义者创造了活动的平台,它们的兴起反映了政治伊斯兰在索马里的强大影响。

随着1991年索马里国家的崩溃,各种类型的伊斯兰组织成为医疗、教育等服务的最有效提供者,伊斯兰法庭则在社会秩序的恢复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0]1993年,第一个法庭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出现,随后,其他法庭陆续建立。1998年,前伊斯兰联盟领导人艾维斯在摩加迪沙南部也组建了两个法庭。为了执行裁决,每个法庭都拥有数量不一的民兵,其薪水由法庭所属部族分支的商人支付。与众多军阀武装不同,法庭民兵由于纪律严明而获得良好声誉,即便批评法庭的人也称:“人们喜欢他们,因为他们不嚼卡特(一种有毒性的灌木嫩枝),不强奸妇女,更富有纪律性。”^[11]

2000年初,为了协调各法庭之间的行动,各法庭领导人成立了沙利亚执行委员会(Shari'a Implementation Council),艾维斯是秘书长。委员会的首要功能是交换罪犯和进行联合军事行动,但同时它也是艾维斯和其他法庭领导人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2004年,摩加迪沙的法庭组建了新组织——索马里伊斯兰法庭最高委员会(the Supreme Council of Islamic Courts of Somalia),宗教学者谢里夫·谢赫·艾哈迈德当选为主席,后来被外界称为伊斯兰法庭联盟的组织就此形成。随之,伊斯兰法庭系统在摩加迪沙迅速扩张,崛起为强大的军事政治力量。

2004年10月,索马里过渡联邦政府成立,临时总统尤素福的反伊斯兰主义倾向使其与伊斯兰法庭联盟直接产生冲突。为了保护自身安全,法庭联盟整合各法庭民兵,建立了下属军事组织——青年运动,艾维斯的亲信阿丹·哈什·阿伊罗(Adan Hashi Ayro)是其领导人。面对法庭联盟的异军突起,2006年3月,在美国支持下,混战多年的军阀实现团结,在摩加迪沙组建了恢复和平和反恐联盟(Alliance for Restoration of Peace and Counter-Terrorism)。5月,双方发生大规模巷战。6月,法庭联盟粉碎军阀联盟,控制了整个摩加迪沙。

自1991年以来,索马里首都第一次处在了统一权威的管辖之下。^[12]法庭联盟拆除遍布各地的路障,清扫垃圾成堆的街道,重新开放飞机场和港口,收缴军阀民兵的武器,归还军阀劫掠的财物,数天之内,首都气象一新。而且,它还严格执行教法,比如禁止电影院放映西方和印度电影、禁止斋月期间进行体育活动等等。^[13]法庭联盟的一些做法确实引起了许多人的反感,但它使首都恢复了丧失已久的和平,因此获得了大批百姓的衷心拥护,^[14]尤其是商人由于安全成本的降低,对法庭联盟给予了很大的同情和支持。此后,法庭联盟又迅速攻占基斯马尤等城镇,控制了索马里中部和南部大片土地。在这期间,由于法庭联盟的积极打击,活跃于沿海地带的海盗活动一度明显衰落。^[15]总之,在国家崩溃的情况下,法庭联盟提供了准制度化的政治权威,基本实现了中南部地区的社会稳定。

但是,法庭联盟也遭到了多种势力的反对。过渡政府视其为政治对手,美国指责其包庇外国恐怖分子,埃塞俄比亚也坚决反对政治伊斯兰在索马里的蔓延。2006年12月,一方面,美国推动联合国通过决议,授权非盟向索马里派遣维和部队,以保护岌岌可危的过渡政府;另一方面,美国以武器和情报,支持埃塞俄比亚军队侵入索马里,联合过渡政府军队,对法庭联盟以毁灭性打击。^[16]次年1月,法庭联盟被逐出摩加迪沙,整个组织解体,政治伊斯兰力量统一国家和重建社会的努力在外力干涉下归于失败。

三、青年运动的崛起

外来的打击使索马里政治伊斯兰陷入了严重的分裂危机。法庭联盟解体后,大部分领导人逃亡厄立特里亚,并于9月在其首都阿斯马拉建立了重新解放索马里联盟(the Alliance for the Re-liberation of Somalia),其内部分为艾哈迈德领导的温和派和艾维斯领导的激进派。2008年5月,以吉布提为基地的温和派开始与过渡政府和谈,并于12月达成协议。据此,临时议会增加275席,其中200席属于艾哈迈德一派的成员,次年1月,新议会选举艾哈迈德为过渡政府总统。就此,温和伊斯兰主义者被整合到过渡政府,成为国际社会承认的政治力量。但艾维斯一派坚决反对和解。2009年2月,激进派联合国内3个较小的伊斯兰组织建立了伊斯兰党(Islamic Party),4月,艾维斯回国后,成为其领导人。它拥有自己的武装,曾控制中南部部分土地。2010年2月,伊斯兰党与青年运动合并,正是

后者成为法庭联盟之后索马里境内影响最大的伊斯兰组织。

青年运动原本是法庭联盟下属的军事组织,但随着前者的解体,它成为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它打起抵抗埃塞俄比亚“外国侵略者”的民族主义旗帜,主张解放索马里,在整个非洲之角建立伊斯兰国家。2007年3月,进入索马里肩负维和任务的非盟特派团(African Union Mission)也被视为侵略者。自2007年年初,青年运动以发射迫击炮、路边伏击等多种形式,频频袭击埃军、过渡政府和特派团。它还在索马里历史上首先把自杀式袭击作为对付敌人的常规手段,^[17]国内冲突由此变得更加血腥。但它抵抗“埃塞俄比亚侵略军”的行动,赢得了众多索马里人的支持。2009年1月,埃军被迫撤离索马里后,青年运动拒绝了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的和解建议,并于3月和伊斯兰党联合攻占摩加迪沙。就此,青年运动成为索马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控制了中南部和摩加迪沙的大部分区域,其范围比鼎盛时期法庭联盟的控制区还要大。

虽然青年运动和伊斯兰党一样,都借助民族主义获取对其反埃行动的支持,但它同时呈现出强烈的泛伊斯兰色彩,并频频使用全球圣战的话语,这在2009年以后表现得更加明显。青年运动秘密在世界各地穆斯林中进行招募和募捐活动,吸引不少人加入其中,美国等地的外国穆斯林进入了领导层,有些甚至成为自杀式袭击者。^[18]它不仅利用CD、录像带和书籍等进行宣传,也通过网络向多国穆斯林宣扬圣战和殉道思想。虽然从索马里驱逐异教徒和执行伊斯兰教法依然是不变的目标,但参加全球圣战和建立跨越国界的哈里发国家成为其长远的规划。在埃军撤离后,西方成为它反对的又一对象,虽然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宣布执行伊斯兰教法,但它指责其是“西方的玩偶”和伊斯兰运动的“叛徒”。^[19]青年运动还主动与基地组织建立联系,逐步把自身纳入了其全球性反西方圣战网络。2009年,其领导人艾哈迈德·阿布迪·戈丹内(Ahmad Abdi Godane)^[20]向本·拉登宣誓效忠。2010年7月,青年运动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发动自杀式袭击,^[21]这是其在索马里之外的首次恐怖活动,标志着它已经从一个民族主义的抵抗运动转变为全球圣战组织。^[22]

进入2010年,青年运动遭遇一系列挫折,开始丧失在索马里人中原有的号召力。坎帕拉的恐怖活动极大地败坏了青年运动的声誉,北美的大多数捐助者就此不再向其捐献资金,青年运动甚至不得不通过砍伐森林缓解经济困境。^[23]随着经济危机的加重,青年运动

内部出现了军事指挥官和圣战者叛逃的现象。2011年,索马里爆发严重饥荒,青年运动阻止部分国际组织在其控制区内救援饥民的做法引发了极大争议和广泛谴责。^[24] 在一些地方,人们甚至拿起武器反对青年运动强行征收钱物。而且,由于内部意见不一致,青年运动领导层出现了严重分裂。2011年8月,青年运动主动撤离摩加迪沙大部分地区。10月和11月,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两国军队先后进入索马里,与政府军一起两面夹击青年运动。2012年初,过渡政府高调宣布要在2012年彻底击败青年运动。1月20日,青年运动被逐出摩加迪沙,这成为2007年以来政府军和特派团取得的最大的军事成就。2月,青年运动领导人戈丹内宣布该组织与基地组织正式合并,这受到了本·拉登之后基地组织领导人扎瓦西里的欢迎和认可,却遭到了众多索马里人的强烈谴责。

当前,经济来源的匮乏、自身形象的败坏和国内外的孤立与打击使得青年运动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但是,它依然是索马里国家重建无法忽视的力量。一方面,它牢牢控制着部分地区,有能力发动暴力袭击,足以对过渡政府和特派团构成威胁;另一方面,过渡政府无力有效行使权威,反青年运动联盟内部也矛盾重重。政治伊斯兰将是索马里未来发展不可避免的话题。

四、索马里政治伊斯兰的特点

由上述可知,在过去二十多年,索马里政治伊斯兰的影响逐步扩大,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索马里独特的“国情”,给其政治伊斯兰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使其呈现出一些鲜明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部族主义的渗透与影响。伊斯兰教和部族是索马里社会的两大支柱,而后者更具决定性作用。索马里民族成分单一,主体民族索马里人占全国总人口的97%,其中绝大多数人都属于某一个部族,其下又有数量不一的部族分支。部族是索马里最重要的社会单元,具有不可替代的政治功能。在索马里人中,部族认同往往高居国家认同之上,决定着人们的政治态度,塑造着他们的政治意愿。部族主义是索马里国家难以消除的痼疾,^[25] 部族之间和内部的矛盾与竞争是索马里社会动荡的基本原因。

索马里现代伊斯兰组织都意识到了部族主义的危害,把部族之间的仇恨视为索马里问题的根源。它们相信,自身能够以宗教为基础实现索马里人的团结,但

实际上,它们大多同样因为意识形态和部族而分裂。大部分伊斯兰组织都以部族为基础,被部族视为以宗教旗帜扩大权益的工具。早期伊斯兰组织穆斯林青年联盟的建立者全部都来自伊萨克(Isaaq)部族。伊斯兰法庭联盟下属的每一个法庭都是以部族为基础的机构,只对一个特定部族分支的成员具有司法权。最早构成法庭联盟的11个法庭,除了一个之外,都由哈维伊部族控制。^[26] 青年运动高调宣称自身“超越了部族政治”,但依然深受部族政治的影响。它最初被外界称为“哈维伊部族的民兵”,后来虽然有意吸收其他部族成员加入领导层,但依然不断卷入部族之间和内部的武装冲突。^[27] 总之,伊斯兰组织无论怎样强调宗教认同,都无法摆脱历史悠久的部族文化的制约。

第二,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交织。一般认为,伊斯兰主义是作为民族主义的对立物出现的,批判世俗的民族主义是中东伊斯兰复兴中存在的普遍现象,但对于索马里多数伊斯兰组织而言,两者是彼此结合、不相冲突的意识形态和思想主张。一方面,索马里伊斯兰组织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大索马里民族主义的支持者和鼓吹者,都要求建立囊括东非所有索马里人居住区域的大索马里国家。在东非,索马里人不仅生活在索马里,而且广泛分布于吉布提、埃塞俄比亚的欧加登地区和肯尼亚西北部地区。索马里自独立后,一直梦想建立由所有索马里人组成的国家。索马里伊斯兰组织继承这一愿望,否定国界的划分,主张“解放”被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吞并”的土地,而这正是它们被周边国家尤其是埃塞俄比亚敌视的一个根本原因。实际上,激发民族主义情绪,反对“外敌”的入侵,正是法庭联盟和青年运动社会动员的有效手段。

另一方面,各伊斯兰组织都强调伊斯兰主义,主张教法治国,声称自身是真正的伊斯兰的捍卫者,试图在整个大索马里建立统一的伊斯兰国家,青年运动甚至与基地组织建立联系,要求建立包括大索马里在内的全球哈里发国家。它们都深信,政治伊斯兰是在索马里确立秩序和实现稳定的最好办法。在控制区内,它们都十分严格地执行伊斯兰教法。对于违反教法者,青年运动施以当众鞭笞、砍首、砍断手脚甚至以石击死等处罚。^[28] 由于法庭联盟和青年运动表面上显示出了教法至上主义,它们先后都被外界称为“索马里的塔利班”。

第三,普遍的武装化和暴力化。1991年以后的索马里,武力决定政治,各支力量几乎同时都是武装组织,暴力是它们对外交往的通行方式。在此情况下,伊

伊斯兰组织的生存和发展也往往通过暴力来实现。换言之,索马里的政治生态决定了伊斯兰组织的武装化和暴力化。鉴于中央政府崩溃,参政渠道匮乏,倘若没有自己的武装,伊斯兰组织便难以自保,更无法实现目标,事实上,暴力是它们在特殊国情下处理对外关系的主要选择。伊斯兰联盟正是为了保护所属部族成员而正式转型为武装组织,伊斯兰法庭联盟则为了维护秩序和执行教法,必须以民兵和武力为后盾。青年运动由于四面树敌,把索马里政治伊斯兰的暴力化推向了顶峰。因此,索马里伊斯兰组织的暴力化很大程度上不是主观选择,而是客观需要。

第四,外部的强大影响。作为处于伊斯兰世界边缘地带的贫穷国家,索马里政治伊斯兰的产生和发展始终都受到外部的有力影响,尤其是沙特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20世纪70年代以来,沙特借助石油美元向外大力输出瓦哈比主义,在东非,索马里是其主要目标。在其主要城镇和一些偏远的乡村,沙特资助兴建了大量宗教学校,学生不仅享受免费的食物和服装,还会获得一定的津贴。^[29]对于家境普遍贫寒的孩子,这些宗教学校无疑具有莫大的优势和吸引力。除此之外,数千名索马里年青人被送往沙特的大学,免费学习伊斯兰教。沙特瓦哈比派由此在索马里迅速传播,成为国内最强大的伊斯兰派别,一些知识分子经过阐释,使瓦哈比主义成为社会政治动员的思想武器和有效工具。由于此,索马里多数伊斯兰组织都深受瓦哈比派影响,并程度不一地继承了其排外、唯我独尊、反对苏菲、强调教法等特征。

20世纪90年代以来,索马里政治伊斯兰加速国际化,成为全球伊斯兰运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青年运动的多名骨干前往阿富汗参战或接受宗教教育,由此深受圣战思想的影响。青年运动领导人戈丹内就曾去阿富汗,与基地组织建立了联系。大量外国圣战者还直接到索马里,与当地穆斯林一起反对“异教徒”。2008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外国穆斯林加入青年运动,有些甚至进入了领导层。依据非盟特派团副指挥官的说法,索马里境内有2000多名来自印度、巴基斯坦、伊拉克等国的武装人员向青年运动提供资金和培训。^[30]青年运动也与基地组织关系日益密切,并最终在2012年2月与其正式合并。成员的多元化和国际化不仅使得青年运动日益激进化,而且使索马里政治伊斯兰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国内问题。

第五,强烈的反苏菲倾向。作为索马里伊斯兰教中的新现象,反苏菲是沙特瓦哈比派传播和渗透的直

接结果。长期以来,苏菲教团主导着索马里伊斯兰教,崇拜圣徒和游访圣墓是索马里穆斯林习以为常的功修方式。但是,瓦哈比派的传入改变了这一状况,致使索马里伊斯兰教严重分化。接受瓦哈比主义的伊斯兰组织固守对宗教的僵化解释,反对沿存已久的苏菲信仰形式,试图实现索马里伊斯兰教的同质化。比如伊斯兰联盟自建立后就批判苏菲教团,耻笑其精神修行的做法,直接导致双方关系紧张。青年运动则把反苏菲行动推向了极端,它建立了反偶像崇拜部(Anti-idolatry Department),专门负责破坏苏菲宗教场所。其武装人员高喊“安拉至大”,在众目睽睽之下摧毁圣地和圣墓,宣称要“根除崇拜坟墓的文化”。^[31]青年运动的做法引发了众多穆斯林的不满和愤怒,自2008年年中起,苏菲组织“先知的信徒”(Ahl al-Sunna wa'l-Jama'a)^[32]多次与其发生军事冲突,成为其军事上主要的对手。

总之,索马里政治伊斯兰的兴起是国内外多种因素作用的产物。没有索马里国家建构的种种难题,就不会有政治伊斯兰的持久兴盛。浓厚的宗教氛围、落后的文化水平、外部思想的持续渗透和本国政局的不断动荡,决定了索马里政治伊斯兰的兴衰和特点。从伊斯兰联盟,到法庭联盟,再到青年运动,政治伊斯兰的影响呈波浪状稳步扩大,索马里国家的危机在日益深化。对于饱受战乱和饥饿之苦的索马里人而言,宗教是心灵的慰藉和希望的来源,政治伊斯兰提供了消除混乱、重建秩序的一种选择。虽然伊斯兰组织表现出了某些极端性,但它们扎根于索马里的现实,代表着部分索马里人摆脱发展困境的一种努力。

[注释]

- [1] 简单而言,政治伊斯兰指被用于政治目的的伊斯兰。
- [2] 目前,国内只有樊小红的论文(《索马里激进伊斯兰组织初探》[J],《西亚非洲》2010年第10期)分析了青年运动和伊斯兰党兴起的原因、面临的挑战以及其影响。
- [3] Michael Shank, "Understanding Political Islam in Somalia", *Contemporary Islam*, Vol. 1, Issue 1, 2007, p. 91.
- [4] Roland Marchal, "Islamic Political Dynamics in the Somali Civil War", in Alex de Waal (ed.), *Islamism and Its Enemies in the Horn of Afric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19.
- [5]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Somalia's Islamists", *Africa Report*, No. 100, 12 December 2005, p. 5.
- [6] A. Duale Sii'arag, "The Birth and Rise of Al-Ittihad Al-Islami in the Somali Inhabited Regions in the Horn of Africa",

- November 13, 2005, http://wardheernews.com/articles/November/13_Alittihad_Sii'arag.html, retrieved on February 25, 2012.
- [7] Ken Menkhaus, "Political Islam in Somalia", *Middle East Policy*, Vol. 9, No. 1, March 2002, pp. 11-13.
- [8]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Somalia's Islamists", *Africa Report*, No. 100, 12 December 2005, p. 9.
- [9] Matt Bryden, "No Quick Fixes: Coming to Terms with Terrorism, Islam and Statelessness in Somalia",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Studies*, Vol. 23, No. 2, 2003, p. 32.
- [10]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Somalia: Countering terrorism in a Failed State", *Africa Report*, No. 45, 23 May 2002, p. 9.
- [11]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Somalia's Islamists", *Africa Report*, No. 100, 12 December 2005, p. 20.
- [12] Cedric Barnes and Harun Hassan, "The Rise and Fall of Mogadishu's Islamic Courts", *Journal of Eastern African Studies*, Vol. 1, No. 2, July 2007, p. 152.
- [13] Shaul Ahay, *Somalia between Jihad and Restorati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8, pp. 99-100.
- [14] Magnus Norell, *Islamist Networks in Somalia*, FOI Somalia Papers, Report 2, 2008, p. 12.
- [15] Tom Maliti, "Piracy Off Somalia's Coast Increases", October 17, 2007, http://www.hiiraan.com/comments2-news-2007-oct-piracy_off_somalia_s_coast_increases.aspx, retrieved on February 28, 2012.
- [16] Steve Bloomfield, "Somalia: The World's Forgotten Catastrophe", *The Independent*, 9 February, 2008.
- [17] Solomon A. Dersso, *Somalia Dilemmas: Changing Security Dynamics, But Limited Policy Choices*, ISS Paper 218, October 2010, p. 5.
- [18] Muhyadin Ahmed Roble, "Al-Shabaab Desertions Increase in Southern Somalia", *Terrorism Monitor*, Vol. 9, Issue 1, January 1, 2011, p. 6. 在肯尼亚、也门、英国和美国等国,有 200—300 万索马里移民和难民,他们是青年运动资金和人员的重要来源。参见 Solomon A. Dersso, *Somalia Dilemmas: Changing Security Dynamics, But Limited Policy Choices*, ISS Paper 218, October 2010, p. 8.
- [19]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Somalia's Divided Islamists", *Africa Briefing*, No. 74, 18 May 2010, p. 6.
- [20] 2008 年 5 月,前青年运动领导人阿伊罗被美国发射的导弹炸死,戈丹内继承领导权。
- [21] 2010 年 7 月 11 日,青年运动对坎帕拉观看足球世界杯决赛的人群发动自杀式袭击,致使至少 74 人死亡。
- [22] Solomon A. Dersso, *Somalia Dilemmas: Changing Security Dynamics, But Limited Policy Choices*, ISS Paper 218, October 2010, p. 7.
- [23] Muhyadin Ahmed Roble, "Al-Shabaab Razes Somali Forests to Finance Jihad", *Terrorism Monitor*, Vol. 8, Issue 42, November 18, 2010, p. 5.
- [24] 2011 年 11 月,青年运动禁止联合国高级专员难民办事处等 16 个组织进行救援,其理由是它们在收集圣战者的信息和数据、引诱当地人反对执行伊斯兰教法以及损害穆斯林的文化价值观等。参见 "Somalia's Al-Shabaab Explains Its Ban on Foreign Aid Organization", *Terrorism Monitor*, Vol. 9, Issue 45, December 9, 2011, pp. 1-2.
- [25] Jeffrey Gettleman, "Clan Politics Dictate the Future of Somalia",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2, 2007, http://www.nytimes.com/2007/01/22/world/africa/22iht-somalia.4295219.html?_r=1, retrieved on February 25, 2012.
- [26] Magnus Norell, *Islamist Networks in Somalia*, FOI Somalia Papers, Report 2, 2008, p. 17.
- [27] 详情参见 Ahren Schaefer and Andrew Black, "Clan and Conflict in Somalia: Al-Shabaab and the Myth of 'Transcending Clan Politics'", *Terrorism Monitor*, Vol. 9, Issue 40, November 4, 2011, pp. 7-11.
- [28] Solomon A. Dersso, *Somalia Dilemmas: Changing Security Dynamics, But Limited Policy Choices*, ISS Paper 218, October 2010, pp. 7-8.
- [29]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Somalia's Divided Islamists", *Africa Briefing*, No. 74, 18 May 2010, p. 3.
- [30] Muhyadin Ahmed Roble, "Al-Shabaab Desertions Increase in Southern Somalia", *Terrorism Monitor*, Vol. 9, Issue 1, January 1, 2011, p. 6.
- [31] Raffaello Pantucci, "Al-Shabaab Proscribed in Canad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Terrorism Monitor*, Vol. 8, Issue 11, March 19, 2010, p. 6.
- [32] 该组织由传统苏菲领导人建立于 1991 年,旨在维护苏菲传统和利益,反对现代伊斯兰组织。

作者简介:李福泉,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讲师,历史学博士。(西安,710068)

收稿日期:2012-04-15

修改日期:2012-05-20

“hegemony” about China. Ideologically, China is portrayed as communist power. In addition, textbook descriptions of Jiandao and Changbai Mountain issues might lead to more territory conflicts in the future.

Theoretical Probes

51 Feminist Epistemology: Criticism and Construction of Mainstream IR Epistemology

by Su Yunting

The difference in epistemology is the main cause which leads to the emergence of differen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o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ism and positivism, mainstream epistemology tries to prove the objectiv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ccording to the model of independent man, mainstream epistemology establishes the premise that man dominates reason and international practice, shap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with male characteristic. In view of the gender characteristics of mainstream epistemology, feminism advocates adding and establishing women's cognitive status, and takes women's practices and experiences as basic sources of the knowledg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is constitutes feminist empiricism and standpoint. Guiding empiricism by standpoint, criticizing epistemology of mainstream can create a new feminist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untries and Regions

57 The Course of Governance of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the Rereading of the Four State of the Union Messages

by Mei Renyi

State of the Union message is the American president's report on the work he has done in the past year and his attention and arrangement in the coming year. The State of the Union every year is a reflection of the changes i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Therefore, the reading of the State of the Union will make us understand better the situation America is in, the mood of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the decision-makers, their grasp and analysis of the issues they face and the measures they are going to take. We can also get to know from the four State of the Union messages the change of the mood of the president, his relation with the Congress and the intensification of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65 A Study of the Alternation Mechanism of Japanese Prime Ministers in the Postwar Period

by Qu Jing

The mechanism of the alternation of prime ministers, that is, the ruling party nominates the prime minister and the Diet appoints it, was adopted in Japan in the postwar period. Due to the specificity of party politics, the prime minister was alternated within one party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Short life span of a prime minister still exists even though the Democratic Party comes to power instead of the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The election system and the reporting way of media that caters to the people ar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frequent alternations of prime ministers. The frequent alternation of prime ministers results in the changes of Japan's internal and foreign policies which increases the difficulty for other countries to cope with.

71 The Evolution of Somali Political Islam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by Li Fuquan

Somali political Islam originated in the 1960s, and grew in the 1990s. Its development roughly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which were represented successively by Islamic Union, Islamic Courts Union and Youth Movement. Owing to Somalia's special national condition, its political Islam shows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penetration and influence of tribalism, mingling of nationalism and Islam, militarization and violence in general, powerful external influence, and strong anti-sufi tendency. Fundamentally Somali political Islam roots in the reality of Somalia and represents the effort of some Somalis to get rid of development dilemma.